

昔闻湘水
浪湘水
望高丘
欲春鼓
盈秋月

子干

鲁迅与历史·文学及其他

松元先生礼庸

偶以奉唐

染今闻湘水胭脂
湘水皓如素月窥形
中夜芳茎冬卉无
八人不闻太平成象

李鸿然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97

唐

鲁迅与历史、文学及其他

李鸿然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4.625印张 1插页 113,000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

统一书号：10107·282 定价：0.50元

目 录

鲁迅与历史遗产.....	(1)
鲁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17)
鲁迅与孙中山.....	(39)
鲁迅与文艺批评.....	(53)
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与胡适的小说考证.....	(66)
《汉文学史纲要》的治史方法.....	(90)
鲁迅论魏晋作家.....	(103)
鲁迅杂文与精神文明.....	(113)
鲁迅与民族问题.....	(126)
后记.....	(144)

鲁迅与历史遗产

鲁迅曾自谦地说：“我是毫不治史学的。所以于史学很生疏。”^①但是事实上，这位被毛主席盛赞的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和伟人，不仅非常熟悉史学，认真研究过大量历史遗产，而且在史学领域留下了辉煌的战绩，为我们树立了正确对待历史遗产的光辉榜样。今天，当进一步建设和发展无产阶级史学的时候，重温鲁迅关于正确对待历史遗产的许多精辟论述，学习他研究历史遗产的宝贵经验，我们感到分外亲切。

—

一九二五年初，北京《京报副刊》开辟了一个“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的专栏，约文化界知名人士为青年开列必读书单。一些别有用心的文人借机喧嚣鼓噪，提倡尊孔读经。针对这种情形，鲁迅在该刊给他的表格上赫然写道：“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②。这个表格见报后，社会上毁誉纷纷，赞同者不少，诽谤者也大有人在。尊孔读经的吹鼓手们一哄而起，疯狂围攻鲁迅，有人甚至为此叫他“搬出中国去”^③。五十多年来，对这件事一直有辩之者，有攻之者，成了一桩历史公案。直到一九七四年五月，“四人帮”控制的报纸还抛出题为《鲁迅的一张“白卷”》的专

① 鲁迅：《集外集拾遗·又是“古已有之”》。

② 鲁迅：《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③ 鲁迅：《华盖集·我的“籍”和“系”》。

文，就此事大发议论，硬把鲁迅同臭名昭著的“白卷”典型捆绑在一起，将鲁迅涂抹成一个完全否定历史遗产的虚无主义者。

鲁迅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吗？这是不可不彻底辩论清楚的大是大非问题。在“五四”时期反对封建文化的狂飙中，一般进步的文化人，包括文化革命的一些领导人，由于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观察问题，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在历史遗产问题上，有的确实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鲁迅则不然。填此表格时，他已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历史唯物主义成分正在增长，因此他对历史遗产的看法远远超出了一般进步文化人的水平。鲁迅在批判“国粹主义”的同时，也反对那种对中外历史遗产一概拒绝的态度。鲁迅的“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主张，有具体的现实针对性和特定的政治内容。当时胡适之流打出了“整理国故”的黑旗，诱骗青年“踱进研究室”。军阀政府更利用其反动的国家机器，强令人们尊孔读经，对孔丘和封建文化作揖磕头。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鲁迅的上述主张是正确的，有着强烈的战斗意义。但是鲁迅从来没有完全否定过研究历史遗产的重要意义。恰恰相反，他自己一贯注意研究历史遗产。早在五四运动以前，鲁迅就认真阅读了不少历史典籍，对历史遗产做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他辑佚、编选、校勘、著述，钩沉勘谬，剔误抉奇，评论分析，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五四运动以后，就在提出上述主张的时期，鲁迅多年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引导青年对历史遗产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他这一时期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不论是从文学角度还是从史学角度看，都是里程碑式的著作，堪称研究历史遗产的范本。后期，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鲁迅对历史遗产的认识更正确更深刻了。他指出：“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①对于当时中国没有正确的本国史与世界史，鲁迅极为遗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

憾，认为这必然造成“妄人信口开河，青年莫名其妙”的局面，不能使人“知今知古，知外知内”^①。为此，鲁迅多次号召认真翻译较好的世界史，编写正确的本国史，以供学习研究。他自己到了晚年，还想从头到尾把二十四史读完，并且一直未忘情于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和一部中国文字变迁史。大量事实雄辩地说明，鲁迅一贯重视历史遗产，仅就鲁迅在特定背景下提出过“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一件事便把鲁迅说成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是极为荒谬的。

鲁迅为什么如此重视历史遗产？为什么一再号召研究历史？综合研究一下，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为了帮助无产阶级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鲁迅指出：“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②。还指出：“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③“过去”、“现在”、“未来”三者，是互相联系的。“过去”的影响，反映于“现在”的事物之中；而“现在”的情形，又是过渡到“未来”的前提。因此，研究“过去”，有助于认识“现在”，预见“未来”，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获得斗争的主动权，夺取革命事业的胜利。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曾把研究历史当作争取中国革命胜利必须进行的整个调查研究的一部分，当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要求共产党人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而且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鲁迅的认识，同毛主席上述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第二，是为了帮助无产阶级汲取各方面的历史经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决不能撇开前人的经验。前人的经验，特别是历代劳动人民积累下来的

① 鲁迅：《致姚克》（1934年4月9日）。

② 鲁迅：《华盖集·答ks君》。

③ 鲁迅：《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

经验，不论是成功的或失败的，都值得认真学习和研究。这种学习研究，是我们在三项伟大运动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重要基础之一。鲁迅精辟地指出：“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① 鲁迅以《本草纲目》为例，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本书记载的药物的功用，不仅包括中国历代人民的经验，还有印度和阿拉伯历代人民的经验，其中自然难免有捕风捉影的成份，“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② 因此，对于象《本草纲目》这样的优秀医学遗产，就必须认真学习研究。同样，其他优秀的历史遗产，也都是宝贵的历史经验的结晶，决不可弃置不用。

其三，是为了帮助无产阶级发展自己的文化。任何阶级发展自己的文化，一方面要依靠自己的斗争实践，另一方面要凭借历代的文化传统。无产阶级发展自己的文化，也不能脱离文化遗产，白手起家。鲁迅在分析列宁、斯大林领导下苏维埃文化发展时说：“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③ 这段话准确生动地概括了无产阶级遵循历史辩证法批判继承历史遗产，并在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自己文化的实际过程。这个过程里，不但有“对立”和“反抗”，而且有“承传”与“择取”。在著名的《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面对当时全盘否定历史遗产的倾向，响亮地提出了“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的战斗口号，批判了怕被历史遗产“污染”的“孱头”和想把它“放一把火烧光”的“昏蛋”。他主张“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然后“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鲁迅认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

①② 鲁迅：《南腔北调集·经验》。

③ 鲁迅：《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

为新文艺。”文艺的发展是这样，整个文化的发展也是这样。

历史遗产浩如烟海，内容有好有坏，时间有近有远，价值有高有低，应当着重继承什么，“拿来”什么呢？

鲁迅并不对剥削阶级的历史遗产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尤其是对于处在上升时期具有一定革命性的剥削阶级的遗产。处于没落时期的剥削阶级遗产，鲁迅也采取了分析的态度，因为这时剥削阶级内部总发生分化，其中一部分人会成为叛逆，他们的东西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即使对于另一部分内容反动的剥削阶级遗产，鲁迅也主张加以研究。他认为，通过这种研究，可以认识今天剥削阶级的本质及其历史命运。他说，这样的历史遗产“本来是过去的陈账簿”，“倒也可以翻翻”。为什么呢？因为“翻翻”即研究之后，能够“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①这是鲁迅早年的认识，然而却是相当深刻的。到了后期，当鲁迅懂得了列宁的两种文化学说以后，他在号召研究具有一定认识价值的剥削阶级历史遗产的同时，特别强调研究并继承劳动人民的遗产。他把历史遗产分为“对立”的两类，一类是“消费者”的，一类是“生产者”的，提倡“为大众”研究与继承“真正的生产者”的东西。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学者鼓吹英雄史观，否认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说中国劳动人民自古以来都缺乏“自信力”。鲁迅给予了彻底地批驳。他呼吁认真学习历代劳动人民的遗产，以便充分认识劳动人民的历史力量。他斩钉截铁地指出：“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②这些主张，至今仍闪耀着战斗的历史唯物主义光辉，对我们努力研究继承劳动人民的历史遗产有激励作用。

鲁迅生活战斗的年代，既有见了外国文化就顿首再拜的崇洋

① 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媚外主义者，也有想把外国文化拒于国门之外的所谓国粹派。鲁迅反对前一种倾向，也反对后一种倾向。当鲁迅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就根据我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需要，倡导研究外国历史遗产，批判了“每遇外国东西”，便“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的态度，主张用革命的气魄，“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①吸收外国优秀的文化。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进一步说：“虽是西洋文明吧，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象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②。这种论述，有鲜明的针对性，很强的说服力，充满了唯物辩证法。后期，鲁迅还反复提倡“介绍外国思潮，翻译世界名作”，对于那帮堵塞“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的角色，表示了强烈的阶级义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因此必须把这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③这一时期，鲁迅自己身体力行，认真研究外国历史遗产，翻译了许多世界名著，为中国人民输送了大量的精神粮食。

鲁迅还非常注重研究和继承近现代的遗产。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由于反动派的提倡，崇古气氛十分浓厚，一些头脑冬烘的学者文人，心目中只有古代，没有近代与现代。鲁迅批判了这种“贵古而贱今，忽近而图远”^④的倾向，引导史学界注意对近现代史的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充满了阶级敌人的残酷压迫剥削，也充满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认真研究这段历史，对正在同反动统治阶级鏖战的革命者，无疑具有直接的教育与鼓舞作用。正是从这种意义上，鲁迅一再呼吁研究近现代历史的著作

① 鲁迅：《坟·看镜有感》。

②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

③ 鲁迅：《准风月谈·由聋而哑》。

④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问世。他愤怒而遗憾地写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箝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一直继续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但也许不能开口。即以前清末年而论，大事件不可谓不多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拳变，八国联军，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们没有一部象样的历史著作”^①。在当时，写出一部“象样的”近现代史著作，总结近现代阶级斗争经验，代表被压迫人民“开口”，对于促进革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具有何等重要的现实意义啊！为了鼓舞革命人民的斗志，鲁迅特别强调研究资产阶级革命先驱的文章，称之是“贵重文献”，希冀有人辑录校印，“以示天下，以遗将来”^②。在《〈守常全集〉题记》中，鲁迅对“一切死的和活的骗子的一叠叠的集子”万分鄙弃，满怀激情地讴歌了李大钊同志的遗文：“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鲁迅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同志的遗文的态度，何等正确，同那些妄图否定革命先烈的历史丑类的态度相比，构成了多么强烈的对照！

二

对于历史遗产，必须贯彻批判继承的原则，正确处理批判与继承之间的关系。继承与批判，吸收与创造，彼此不可分割，是对立的统一。鲁迅掌握了这个辩证法。他对历史遗产一分为二，不但注意继承与吸收，而且强调批判和改造。

旧时代的遗产总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无产阶级既要坚决吸收人类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又要清除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腐朽、落后的东西，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要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② 鲁迅：《致许寿裳》（1936年9月25日）。

就必须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原则。鲁迅从理论和实践上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九三三年，有人问他该看什么书，他答道：“据我的私见，首先是改看历史”^①。同年，他还说：“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②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改看”和“另编”。为什么？因为：剥削阶级的历史遗产，总带有剥削阶级的偏见；历代劳动人民的东西，也常常带有剥削阶级的影响，它们都会有旧时代和旧阶级的烙印。同时，历代的剥削阶级及其史学家们，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又常常对历史遗产实行不同程度的歪曲或篡改。鲁迅早就指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③ 这段话，实际上已接触到为什么要批判地继承的问题了。后来，鲁迅更明确地说：“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④，因为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⑤ 为了这种政治目的，他们对历史遗产“全毁，抽毁，剝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⑥ 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磨灭优秀历史遗产中的战斗锋芒，掩盖历史的真相。所以鲁迅深有感慨地说：清人说“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我以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⑦ 这些尖锐深刻的话，准确生动地概括了整理历史遗产问题上的阶级斗争。这里鲁迅并没有完全否定诸如明刻本或四库本之

① 鲁迅：《致徐懋庸》（1933年12月20日）。

② 鲁迅：《致曹聚仁》（1933年6月18日）。

③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

④ 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⑤ 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

⑥⑦ 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类的历史遗产的价值，也没有完全否定剥削阶级的优秀史学家们整理历史遗产方面的贡献。但是鲁迅清醒地看到了整理历史遗产方面的阶级斗争。这正是他要求“另编”历史的基本原因之一。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懂得，鲁迅所说的“另编”问题，实际上就是有破有立，批判继承的问题。

批判继承的关键，在于对历史遗产坚持阶级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分清精华与糟粕，剔除糟粕，吸取精华。鲁迅认为，对于历史遗产，必须按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加以仔细的分析 and 正确的批评”，搞清楚哪些是滋养人的“食物”，哪些是毒害人的“砒霜”^①，然后决定弃取。鲁迅的深刻处还在于，他并不认为搞清楚“食物”与“砒霜”就算完了。他认为：对这二者，仍要加以分析。他告诉人们，即便是最优秀的“古文化”，也都还有两重性：既“裨助着后来，也束缚着后来”^②，只能吸取前者，不能吸取后者。他打了个生动而贴切的比喻：“恰如吃用牛羊”，应该“弃去蹄毛，留其精粹”，这样才会“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③。换句话说，要是兼收并蓄，蹄毛精粹一齐吃，精华糟粕都接受，对人体仍然是有害的。这些论述，都表现了鲁迅对历史遗产的“仔细的分析”精神，说明了鲁迅批判继承思想的完整性与彻底性。

鲁迅反对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更反对把糟粕当精华，赞扬毒素。在鲁迅战斗的年代，地主资产阶级阻挠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鼓吹历史遗产中的糟粕，用反动思想毒害人民群众。鲁迅无情地揭露了阶级敌人这种卑劣伎俩。不论是在同“国粹派”、“学衡派”、“甲寅派”的斗争中，还是在同“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中，鲁迅都着力批判了那种鼓吹糟粕，赞扬毒素的罪恶行径。他在批判“国粹派”时写道：“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

① 鲁迅：《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上）》。

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③ 鲁迅：《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

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①这个比喻，透辟地说明了把历史遗产中的糟粕当作“国粹”的荒谬性和剔除糟粕的必要性。鲁迅十分注意揭露鼓吹糟粕、赞扬毒素的反动派的政治目的。五卅运动后，曾极力要人们“整理国故”的胡适，抛出了《爱国运动与求学》的黑文，心怀叵测地用歌德在拿破仑围攻柏林时期研究历史遗产的事，诱骗青年闭门读书，吸收毒素，胡说这才是青年的“正路”。鲁迅为此写了杂文《一点比喻》，把胡适比作带着“胡羊”进入“屠场”的“山羊”，指出他是想用历史遗产中的糟粕毒害青年，使青年麻木不仁，好任凭反动统治阶级宰割。鲁迅指出：胡适所说的“正路”，恰恰是一条“死路”。后期，鲁迅对于赞扬历史遗产中毒素的反动派继续进行了深刻批判。一九三四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加紧侵入我国，出于反共卖国的目的，蒋介石大搞所谓“新生活运动”，掀起了尊孔读经的恶浪。适应这种政治需要，一帮反动政客和地主资产阶级文人把各种历史糟粕捧上了天。什么仁政王道，阴阳五行，小脚长辫，扶乩请仙等等，都成了国宝一样的东西。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反动文人则拚命鼓吹明代一些所谓“独抒性灵”的小品，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这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它反映了一种反动的社会思潮，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革命政策服务的。鲁迅在许多杂文中对这些现象作了深刻鞭挞。其中有一篇题为《“天生蛮性”》，全文只有三句话，二十四个字：“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文章撮取三个典型人物，说了三桩典型事件，出奇制胜，有力地揭露了敌人。辜鸿铭多年做张之洞的谋士，曾无耻地把缠足当作中国的精神文明夸示于国内外；郑孝胥那时

①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五》。

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极力宣扬孔孟的王道仁政和日本的“王道乐土”；林语堂、周作人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置一辞，却从血泊中寻闲适，因大谈“性灵”而名噪一时。鲁迅对这三个散发着恶臭的活靶子的批判，概括了深广的政治内容，从政治上给了那些专门鼓吹糟粕的反动派以致命的打击。

对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是为了推陈出新，满足无产阶级的现实需要。鲁迅历来反对墨守陈规，总是大力提倡在批判继承基础上的革新创造。他谈到无产阶级新文艺的发展时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①不但要“择取”中外历史遗产，而且要“加以发挥”，“别开生面”。这不但是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道路，也是整个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道路，是一项至关重要而又普遍适用的原则。旧时代旧阶级的遗产，当然不能完全适应新兴的无产阶级的现实需要。当时有人主张用汉代以后的词、秦代以前的字和西方文化带来的字与词拼成所谓“光芒的新文学”，鲁迅断然否定了这种意见。他精辟地指出：“这光芒要是只在字和词，那大概象古墓里的贵妇人似的，满身都是珠光宝气了。人生却不在拼凑，而在创造，几千百万的活人在创造。”^②抱残守缺，抄袭模拟，机械拼凑，只能得到僵死的东西，造成文化的停滞与倒退，引导人们颂古非今，向后看。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革新创造，才是无产阶级新文化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可以说，革新创造是批判继承的出发点与归宿。所以鲁迅反复强调：“新的建设的理想，是一切言动的南针，倘没有这而言破坏，便如未来派，不过是破坏的同路人，而言保存，则全然是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

② 鲁迅：《准风月谈·难得糊涂》。

旧社会的维持者。”^①这里，鲁迅不但说明了“新的建设的理想”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以此为准绳，划清了无产阶级文化的建设者同“未来派”以及“旧社会的维持者”之间的界限。

在处理批判继承与革新创造关系方面，鲁迅也给我们做了正确的示范。鲁迅认真研究了各种历史遗产，但不是拜倒在历史遗产糟粕之前的国粹主义者；他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却并非那种背着崇洋媚外甲壳的全盘欧化论者。鲁迅的作品，不论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是杂文，都是在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精华后形成的，但是他又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创造。他的作品有独特的风格，是前无古人的崭新的文化珍品。

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鲁迅，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原则，批判了形形色色“左”的和右的倾向。在《拿来主义》中，鲁迅在批判怕被历史遗产“染污”的“孱头”和想把历史遗产“放一把火烧光”的“昏蛋”的同时，还批判了“接受一切”、大吸历史遗产中的“鸦片”的“废物”。这种批判几十年来一直未失掉战斗意义。拿“四人帮”来说，他们肆意践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原则，一忽儿鼓吹历史虚无主义，一忽儿大搞全盘继承，完全集“孱头”、“昏蛋”和“废物”于一身了！他们策动的所谓“评法批儒”之类，不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而且粗暴地蹂躏了我国几千年来的历史遗产，给史学领域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这场灾难，远在当年古书的“三大厄”之上。他们从反动的实用主义出发，随心所欲，信口雌黄，把我国几千年来大批优秀的历史遗产判定为儒家的东西，予以“彻底的扫荡”；又给历史遗产中最反动最腐朽的东西贴上法家的商标，当成“最革命”“最先进”的“文化珍品”加以赞美。他们大吸历代剥削阶级“剩下的鸦片”，却自我标榜为鲁迅的“拿来主义”。然而，只要我们把他们的“拿来主义”与鲁迅的“拿来主义”稍加比较便可发现：他们的“拿

^① 鲁迅：《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

来主义”剔除精华，专取糟粕，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原则，是全盘继承论的新变种，同鲁迅的“拿来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三

鲁迅对历史遗产的研究和评价，既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尊重客观历史实际，真正做到了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鲁迅不是一个专做历史研究的一般历史学家，更不是那种唯恐政治斗争的烈火烧了自己手指的庸人，而是一位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的伟大战士。当时，有人标榜为历史而历史，他却公开举起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旗帜。他对历史遗产的研究，不论是从动机看还是从效果看，都是适应革命事业需要的。早在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时，鲁迅研究历史遗产的目的性就已相当明确了。一九二六年他在《马上支日记》中曾写道：“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此外，则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在现今社会上的势力；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战国游士说动人主的所谓‘利’‘害’是怎样的，和现今的政客有无不同；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历来‘流言’的制造散布法和效验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实在多。”这一连串的研究题目，都注意到了古代与现代的历史关系，都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出发点是要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后，鲁迅更把对历史遗产的评价有机地溶合到革命舆论中，谈古论今，促使中国人民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一时期鲁迅对历史遗产的评价，充分表现了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与伦比的革命精神。

然而，鲁迅评价历史遗产的时候，革命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他是一位实事求是的模范。什么叫实事求是？毛主席作过最精辟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鲁迅评价历史遗产始终坚持了这种科学的态度。

鲁迅评价历史遗产时，注意掌握大量的丰富的材料，能够全面地看问题。

鲁迅认为，对于任何历史遗产，都必须知道它的全貌，然后才可能正确地评价它。他自己整理古籍过程中，“废寝辍食，锐意穷搜”^①，正面与反面的材料，他都努力搜集。但是有些人却不注意这一点。他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要颠，要睡觉”，因此，“所见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鲁迅指出：“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②。这段话包含着深刻的哲理。认识任何事物，都必须首先掌握大量的丰富的材料，然后再对这些材料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才能抓住本质和主流，得到正确的结论。评价历史遗产也是这样。如果一开始就不愿掌握大量的丰富的材料，只靠零碎不全的东西，如何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鲁迅反对随意剪裁或改铸历史材料，十分强调从事实的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对于那种不顾全文的思想倾向和作者的整个思想体系，只取片言只语，随意抑扬，借以自欺欺人的论客，他多次给予了抨击。他说：“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

① 鲁迅：《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

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